

日本史学中“近世”概念的流变^{*}

喻 乐

【提要】 日本史学中“近世”一词,出现于江户时代,原是当时人自指,即“最近时代”之义。明治维新之后,“近世”所指时代仍为江户时代,其涵义则与近代对立,以至于被归入中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史学的发展使近世得以脱离中世范畴,被视为一个独立时代概念。而在地域研究和近代化论兴起的背景下,近世与当代的关系得到强调,近世的内涵又出现了“最近时代”的意味。“近世”概念出现至今,经历了变义、独立而回归的过程。

【关键词】 近世 近代 封建 幕藩体制

现在日本史学中所谓的“近世”时期,是指从安土桃山时代至江户时代末期的约三百年。^①“近世”一词的概念几经变化,其最早出现于江户时代,当时人用“近世”指称自己所处的时代,如安积淡泊谈到同时代的林罗山时,称其为“近世林道春”。^②明治以来“近世”概念则脱离“最近”,而有“前近代”的内涵,如佐野学的《日本社会史序论》将“近世”与明治以后的“今日”截然分为两个时代,在日本的唯物主义史学界,近世被视为“封建中世”的一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学界又以“近世”与中世有着本质区别,视其为独立的历史阶段,如山田舜即持此论。^③20世纪60年代以来,有不少学者提到近世与当代之间的连续性,谷泽永一甚至提出以“织丰时代”为日本近代化的开端,^④则是将近世再次视为“最近”。

日本学者在对近世史学史的梳理中,多以研究主旨与具体课题的变换为基本,把握近世研究的进展。1965年朝尾直弘在《近世的方法意识》一文中总结此前的近世研究时提出,学界对近世的研究主旨自以“幕末发展阶段”为中心,转向以“近世社会构造”为中心,故关于近世的研究课题也从近代化萌芽、绝对主义政权等转向太阁检地、封建小农等问题。^⑤类似地,1975年尾藤正英在梳理前人的近世研究时,也认为近世研究一度旨在说明近世的封建性质,其后则重在探究近世的社会构成,因此研究课题有所变化。^⑥1993年朝尾直弘再次梳理近世研究时,注意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的以“幕藩国家论”为中心的近世研究。^⑦2014年,藤井让治同样根据前人研究主旨总结近世史学史,

* 本文是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项目编号:201706380083)的阶段性成果。

① 藤井讓治「近世史への招待」、大津透編『岩波講座日本歴史』(第10卷)、岩波書店、2012年、第3頁。

② 松本三之介編『日本思想大系・近世史論集』、岩波書店、1974年、第269頁。

③ 山田舜『日本封建制の構造分析』、未来社、1956年。

④ 谷沢永一:「日本の近世は『忍び足の近代化』だった」、大石慎三郎編『江戸時代と近代化』、筑摩書房、1986年、第374頁。

⑤ 朝尾直弘「近世史の方法意識」、朝尾直弘『日本近世史の自立』、校倉書房、1988年、第8—137頁。

⑥ 尾藤正英「近世史序説」、尾藤正英編『岩波講座日本歴史』(第9卷)、岩波書店、1975年、第1—32頁。

⑦ 朝尾直弘「16世紀後半の日本——統合された社会へ」、朝尾直弘編『岩波講座日本通史』(第11卷)、岩波書店、1993年、第1—68頁。

认为近世研究主旨先后经历封建制度论、社会构成论、幕藩国家论、地域社会论,是故近世研究课题也随之不断变化。^①国内学者论及日本近世,则多以其为封建制度的完善时期,“幕藩体制”是其表现形式,如左学德、吴建华、童云扬都持此论点。^②笔者认为,虽然“近世”一词在时代指称上大致固定,但“近世”的内涵则在不断变化,变化背后,是近世研究不断发展的表现。“近世”一词如何变义,如何成为独立时代,又如何回归当代?本文拟阐述日本史学“近世”概念的变化过程,并讨论其背后的学术发展脉络。

一、江户时代的“近世”概念

“近世”一词最初见于江户时代的著作。本居宣长将“近世”训读为“近き世”,其本义即“最近时期”之意。^③作为“最近时期”使用的“近世”一词,贯通江户时代始终,常常见于文人笔端,如安积淡泊在《大日本史论赞》中谈到“近世林道春之论”,^④即因林罗山(号道春)与作者是同时代的人物,故以“近世”称之。山鹿素行在《中朝纪实》中提到神道教“近世杂浮屠之法,大变上古之制”,^⑤也是批评作者所处时代的神道教的变化与佛教混同,不同于古代了。大月履斋在《燕居偶笔》中提到“近世神社佛阁日益壮大”,^⑥人见恱在《人见恱右卫门上书》中提到“本邦近世亦有似此养儿院之政”,^⑦松平定信在《政语》中曾写到“近世诸儒多不知宋儒之礼”,^⑧也都是沿用“近世”一词本义,就当代时事发出议论。同时,江户时代的人也常用一些同义词与“近世”混用,同样可以说明“近世”一词的本义。如新井白石的书信中既能见到“近世士风极衰”的用法,又常常出现“当代之事”、“今世以武力镇天下”等词,^⑨本居宣长笔下也常常用“近頃”、“今”等词与“近き世”互换,^⑩由此可知,在江户时代人笔下,“近世”一词实为表达“最近时期”的一个常见单词。

与此同时,“近世”也意味着江户时代人对自己所处时代的认同感。随着时间的流逝,江户时代的人们虽然离幕府创立的年代越来越远,但他们历史认识中的“最近”仍可以上溯至江户时代的开端。16—17世纪的日本由战乱走向统一,江户幕府的统治持续了265年之久,基本上保持了国内的和平发展局面。因此,生活在江户幕府统治下的人抱有这样一种历史认识:自德川政权开创以来的时代,是不同于“过去”的“现在”。林罗山在《本朝通鉴》中称江户幕府的建立是“一统合而致太平”,从此开启了日本历史的“治世”。^⑪新井白石则在划分日本历史时期时认为,“本朝天下大势,九

① 藤井讓治「近世史への招待」、大津透編『岩波講座日本歴史』(第10卷)、第1—24頁。

② 左学德《关于日本幕藩体制时期及特征的辨正》,《世界历史》1989年第1期;吴建华《日本幕藩体制的形成及其特征》,《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童云扬《十五十六世纪日本社会经济史论丛》,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此外,在一些涉及日本近世的论文中同样可见这种对近世的定义。例如,韩东育《“八千天日记”中隐藏的近代日本》,《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郑辟楚《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日本近世身份制度的动摇》,《日本问题研究》2016年第2期。

③ 吉川幸次郎編『日本思想大系・本居宣長』、岩波書店、1978年、第452頁。

④ 松本三之介編『日本思想大系・近世史論集』、第269頁。

⑤ 山鹿素行『漢和中朝事実』、大日本国民教育会、1912年、第362頁。

⑥ 奈良本辰也編『日本思想大系・近世政道論』、岩波書店、1995年、第92頁。

⑦ 奈良本辰也編『日本思想大系・近世政道論』、第172頁。

⑧ 奈良本辰也編『日本思想大系・近世政道論』、第266頁。

⑨ 松村明編『日本思想大系・新井白石』、岩波書店、1975年、第455—500頁。

⑩ 吉川幸次郎編『日本思想大系・本居宣長』、第452頁。

⑪ 林恕『本朝通鑑・首卷』、国書刊行会、1918年、第153頁。

变而成武家之代,武家之代又五变而及当代”^①同样以江户幕府的建立为自己所处时代的开端。直到19世纪赖山阳在《日本外史》中仍以为“中世以还,风气东迁,历数尽废,而后大成于我德川氏,致今日太平极盛之治”^②虽然德川幕府的建立距离赖山阳生活的时代已有两个世纪,但对作者而言,江户幕府初创这一事件仍是作者所处“今日”的开端。

故此,出版于1828年的《近世丛语》一书,虽成书年代距离元和偃武这一事件已有二百余年之久,但作者仍然认为,“偃武后则谓之近世之人”。^③对江户时代的人来说,他们的“近世”是江户以降的、与之前时代不同的一个时代划分。“近世”一词反映了时人以江户时代为“自己时代”的历史意识。

即使明治维新之后,江户时代已成过去,而“近世”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留原有的词义与内涵。文明史观的开创者福泽谕吉鼓吹文明进步的意义,在《文明论之概略》中,他提出“上古比之近世,亦如孩童比之成人,在讨论文明程度的时候必然要承认,城市是文明的,近世是文明且进步的”,虽然福泽谕吉生活在明治时期,但依然以“近世”作为“当代”的含义;同时他也提出“中古有镰仓五山,近世有上野东叡山”^④这里的“近世”又是指江户时代。从福泽谕吉的用词来看,虽然明治维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当时学者却大多是出生在江户时代的人,江户时代对其而言相去未远,与明治之后的时代均有“近世”之义,都指“最近的时代”。

二、与“近代”对立的“近世”

在20世纪以来学者的笔下,“近世”概念则发生了变化。对这些学者而言,前人所谓“近世”的江户时代已非自己的亲身体验,而是与自己所处的“近代”存在距离了。在他们笔下,“近世”专用于指称江户时代。例如内田银藏在1903年出版的《日本近世史》中将江户时代称为“近世”,称明治时代为“最近世”,认为江户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复兴堪比西欧历史上的文艺复兴时期,上承“中世”的镰仓、室町时代,下启“最近世”的明治时代,故有此划分。^⑤同时期的福田德三则在1903年出版的《日本经济史论》中以“专制的警察国家之时代”为“近世”,而以明治以后为“今日”,认为江户时代如同英、法两国的专制君主时期,“虽然尚存封建时代的形式,于其实则在封建国家的残留上建立起近世的中央集权”。^⑥这些学者所谓的“近世”,固然已是不同于“近代”的时代,但他们划分时代的标准颇为随意,如内田银藏曾表示对“近世”的划分不过是“以现在为中心,根据距离时间的远近做出区分”。^⑦这些学者虽将“近世”视为与“近代”不同的时代,但这种区分并没有具体的历史意识,并未赋予“近世”以具体的时代内涵。

“近世”在内涵上与“近代”对立,则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唯物史观历史学^⑧发展的结果。随着

① 松村明编《日本思想大系·新井白石》,第184页。

② 赖山阳《重订日本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0页。

③ 角田简大《近世丛语·卷一·凡例》,加贺屋善藏,1828年,第2页上。

④ 福泽谕吉《文明论之概略·卷之五》,《福泽全集》(第3卷),时事新报社,1898年,第21页。

⑤ 内田银藏《内田银藏遗稿全集》(第3辑),同文馆,1921年,第214—220页。

⑥ 福田德三《日本经济史论》,实文馆,1903年,第182页。

⑦ 内田银藏《近世の日本》,富山房,1919年,第3页。

⑧ “唯物史观历史学”的称呼常见于战前史学界,现今日本学界通称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可参见永原庆二《20世纪の日本历史学》,吉川弘文馆,2003年,第89页。

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劳资关系日渐紧张,知识界也不满足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历史解释。在此背景下,河上肇率先向日本学界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形态的变革有其必然性,绝非人类意识的产物,而来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社会经济构造之间的关系。^①据此,史学界的佐野学提出“要将缠绕着日本史的神秘的、观念的、诗歌的要素除去,还原出赤裸裸的经济关系及支配关系”,^②以社会结构变化为基本,认为明治维新不仅是政治革命,更是社会革命,“日本社会于明治维新之后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逐渐摆脱了前代的封建特征,具备了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③即近世因其社会结构而不同于“近代”,有了“前近代”的内涵。1925年,日本的无产阶级运动开始其“方向转换”,从经济运动转向政治运动。在此背景下,福本和夫进一步指出河上肇的唯物史观过于强调经济结构,认为社会结构不仅限于生产关系的总和,还应包括社会中存在的各阶级,强调阶级的对立与冲突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步。^④受此说影响,唯物史观史学兼顾对经济结构与社会阶级、社会形态的分析,使“近世”的“前近代”内涵不仅限于经济意义,且有了“历史阶段”的含义,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资本主义论争”是就明治维新的阶级斗争属性与社会形态而产生的论争。论战双方的劳农派及讲座派虽然对明治维新的历史定位意见不一,但正如井上清所指出的,“明治维新将封建生产方式为主的社会变革成资本主义为主的社会,政治上从纯粹封建国家变革为半封建的绝对主义国家,在这一点上两派意见完全一致”。^⑤讲座派代表野吕荣太郎称明治维新是“布尔乔亚阶级掌握政权”,是“资本家及资本家式地主针对旧封建统治者确立自己的统治权”的革命。^⑥同时,劳农派代表山川均亦称“明治维新的原动力是新兴的布尔乔亚”。^⑦由此,唯物主义史学笔下的“近世”与“近代”间有了社会形态的差异。

近世既然不同于近代,那么近世的具体属性是什么?对此,学界往往以“封建”概括近世。“封建”概念自江户时代开始即用于描述近世,如太宰春台称当时是“天下遂成真封建,与中华之周代略相似”,^⑧究其原义,是指幕藩体制下“分封建国”之义。明治维新之后,当时西方的封建(feudalism)概念为日本学者引入,用以解释日本历史,即将“封建”视为封君封臣制度与封土制的结合,^⑨而“封建”也正是近世的属性,内田银藏在旅欧之后写成的《近世的日本》中称“德川时代大致上可谓封建的”,“所谓封建,一方面是封土关系,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的主从关系”。^⑩而后,唯物史观历史学则以封建的生产方式与等级制度把握“封建”,将其理解成一种社会形态,^⑪在这种语境下,近世同样是“封建”的时代,例如野吕荣太郎认为近世日本“支配性生产方式仍是基于封建性原则的小农经营及手工业”,“国家的各机关、功能也无疑仍是彻底基于封建性原则的”。^⑫类似地,山田盛太郎描述近

① 河上肇『唯物史観研究』、弘文堂書房、1921年、第179—200頁。

② 佐野学『日本社会史序論』、同人社書店、1922年、「序言」第1—2頁。

③ 佐野学『日本社会史序論』、第363頁。

④ 福本和夫『社会の構成 = 並に变革の過程』、白揚社、1926年、第181—218頁。

⑤ 井上清『明治維新史研究の歴史と現状』、歴史学研究会編『明治維新史研究講座』(第1卷)、平凡社、1958年、第3—18頁。

⑥ 野呂栄太郎『初版日本資本主義発達史』(上)、岩波書店、1983年、第223頁。

⑦ 山川均『無産階級政治運動の基調』、希望閣、1925年、第9頁。

⑧ 大日本思想全集刊行会編『大日本思想全集』(第7卷)、先進社、1931年、第237頁。

⑨ 中田薫『法制史論集』(第2卷)、岩波書店、1938年、第933頁。

⑩ 内田銀蔵『近世の日本』、第55頁。

⑪ 福本和夫『社会の構成 = 並に变革の過程』、第218頁。

⑫ 野呂栄太郎『初版日本資本主義発達史』(上)、第52頁。

世时称,“德川幕藩封建制的特征是纯粹封建的土地所有组织与零细耕作农奴经济”。^①

“封建”既成为近世的最重要属性,近世的概念也就隐没于庞大的“封建”概念之中。无论是古典的封建概念、西方的封建概念、唯物史观史学的封建概念,对日本历史上封建制存续的时间看法大致相同,即以镰仓幕府为封建制的开端,历经南北朝、室町幕府、战国时代,至江户幕府为封建制的成熟。故此,作为“近世”的江户幕府不过是封建时代的一部分,在不同标准的日本历史时代划分中,近世并不被视为一个独立时代。如法制史学家牧健二于1935年出版的《日本封建制度成立史》中以政治制度为标准,将日本历史分作古代氏族制度、中世封建制度、近代市民制度三个阶段,其中“中世”涵盖了镰仓幕府至江户幕府的七百年时间。^②唯物史观史学则秉承历史发展阶段论,如福本和夫将历史分为原始社会、古代社会、中世社会、近代有产者社会、将来社会五个阶段,^③并认为日本历史同样适用于这种阶段划分。类似地,羽仁五郎在总结战前唯物史观史学成果时也认为,原始共产制、古代奴隶制、中世封建制、近代资本制的发展阶段论才是适用于世界历史的理论,较基于一国历史得出的历史分期更具普遍性。^④基于这种认识,历史学研究会1956年度大会以“时代区分上的各种理论问题”为主题讨论日本的历史分期,与会者分为古代、封建、近代三组讨论,体现了战后史学界就日本史时代划分的共识,其中“封建”的下限亦包括江户时代。^⑤可以看出,在唯物史观史学的发展阶段论中,“近世”因其“封建”的属性被归为中世。在野吕荣太郎、山川均等学者的笔下,甚至只见“中世”一词,而不见“近世”一词,正是因为学者未将后者视为独立于中世的时代。正如津田秀夫在历史学研究会1956年度大会上所指出,在过去的研究中,近世“在时代区分的设定上被完全忽视了”。^⑥作为历史时期的近世,与“近代”对立,被包括在“中世封建”的庞大时代中。

三、作为独立时代的“近世”

以“封建”把握的近世概念,在脱离了“当代”的本义及内涵之后,则落入了“中世”的范畴,而这种“近世”概念则夹在中世至近代之间,一度成为历史进程中格格不入的特殊时代。战后一段时间内,日本史学界大多以一种规律性的历史进程考量日本历史,例如历史学研究会1949年大会就以封建社会形态到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变迁来描述中世到近代的发展过程。^⑦而近代主义史学的代表大塚久雄则以英国近代化过程为例,认为中世纪晚期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农民结余,并由此产生了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又分化成资本家和劳工,这就是典型的近代化过程。^⑧这类近代主义在理论界影响颇深,导致战后日本中世史的书写也不能摆脱近代的影响。例如,在城市史方面,高尾一彦以中世京都、堺及博多三个城市为例,证明中世日本已出现了自由城市和市民阶级,而江户幕府的成立,尤其

① 山田盛太郎『日本資本主義分析』、岩波書店、1934年、第183頁。

② 牧健二『日本封建制度成立史』、弘文堂書房、1935年、第1—2頁。

③ 福本和夫『社会の構成—並に变革の過程』、第218頁。

④ 羽仁五郎『羽仁五郎歴史論著作集』(第1卷)、青木書店、1967年、第91—118頁。

⑤ 歴史学研究会編『時代区分の理論的諸問題:歴史学研究会1956年度大会報告』、岩波書店、1956年。

⑥ 歴史学研究会編『時代区分の理論的諸問題:歴史学研究会1956年度大会報告』、第106頁。

⑦ 高橋幸八郎『封建社会における基本的矛盾について』、歴史学研究会編『世界史の基本法則:歴史学研究会1949年度大会報告』、岩波書店、1951年、第36—56頁。

⑧ 大塚久雄『近代化の歴史起点』、学生書房、1948年。

是锁国政策的出现,扼杀了自由城市的发展。^①在社会方面,网野善彦以中世“无缘”社会为例,试图说明日本中世并非一个私权力无处不在的封建社会,中世公共场所的人际关系普遍以“无缘”即平等独立为准则,认为“无缘”思想堪比西欧近代早期的市民思想。^②直到1985年,中世史学者脇田晴子仍在《室町时代》一书中盛赞中世,认为室町时代乃近代私有制思想的开端,被统治者抛弃了幕府强加的不平等身份,发展出诸如行会、自治町、自治村这样的共同体。^③在这些中世史学者笔下,日本的中世与西欧中世纪类似,有着向资本主义迈进的因素。

然而日本中世以后的历史并未如西欧历史那样走向近代,而是陷入停滞乃至反动的三百余年,对中世晚期以来的近代化要素,近世不仅没有加以发展,反而加以扼杀,这似乎违背历史发展规律。战后初期日本学界的近世史研究,延续了战前“日本资本主义论争”的课题,将关注点放在近世史中所谓“封建克服”、“变革主体”等要素上,视近世为特殊的时代。如政治史方面,服部之总以近世初期的织丰政权与西方的绝对主义王权相似,认为二者具有对内实行统一战争、对外开展远洋贸易的共性,这是中世晚期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之所以未能像西方那样出现工业化,是因为德川政权的反动政策使日本发展出现倒退。^④又如在社会阶级方面,藤田五郎等经济史学者指出,近世农民的结余不可谓不多,却没有发展成资产阶级,反而上升为专营剥削的“豪农”,变成了资本主义革命的对立面,也是因为日本近世发展的特殊性,农民的封建特性依然浓厚,只能成为封建再生产组织的末端。^⑤服部之总与藤田五郎的近世研究,虽然的确将近世当作独立时代处理,但却是作为一个违反历史发展规律的特殊时代存在的。这实际是借近世史研究日本近代化问题。

从1954年开始,以“封建克服”、“变革主体”为主旨的近世史研究受到批评,开始出现对近世社会构造的分析,其先声即古岛敏雄、永原庆二合著的《商品生产与寄生地主制》,书中质疑藤田五郎关于地主的结论,指出近世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畿内地区,却有着高度发达的地主制度,反映出对近世真实状况认识的不足。^⑥当年的历史学研究大会将“寄生地主”作为讨论主题,开始重新审视以往的近世史研究。与会者认为,近世并未因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推翻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与其说是中产者缺乏资本主义的侧面,不如说近世缺乏孕育资本制度的社会构造性的政治条件”。^⑦换言之,作为封建社会的近世有着“持续而内善的构造”这样的合理性,解释这一社会构造,才是近世研究应关注的焦点。^⑧近世研究的突破,有赖安良城盛昭的论文《太阁检地的历史意义》。安良城盛昭在文中首次反对一直以来对近世的时代划分,认为前人所谓的“中世封建”生产方式,实际上不过是“家父长奴隶制”,直到近世太阁检地之后,名主经济体被打破,小农经济体大量出现,日本才进入真正的封建时代。^⑨安良城盛昭以社会结构入手,重新划分了中世与近世的界限,引起史学界的轩然大波。^⑩

① 高尾一彦「京都・堺・博多」、家永三郎編『岩波講座日本歴史』(第9卷)、岩波書店、1967年、第152頁。

② 網野善彦『無縁・公界・楽』、平凡社、1996年、第129頁。

③ 脇田晴子『室町時代』、中央公論新社、1985年、第250頁。

④ 服部之総『絶対主義論』、月曜書房、1947年、第120—125頁。

⑤ 藤田五郎『藤田五郎著作集』(第3卷)、御茶の水書房、1977年、第281頁。

⑥ 古島敏雄、永原慶二『商品生産と寄生地主制:近世畿内農業における』、東京大学出版会、1954年、第1—15頁。

⑦ 大石慎三郎「寄生地主制の成立とその条件—明治維新と寄生地主」、歴史学研究会編『歴史と現代:歴史学研究会1954報告』、岩波書店、1955年、第95—103頁。

⑧ 朝尾直弘『日本近世史の自立』、校倉書房、1988年、第19—24頁。

⑨ 安良城盛昭「太閣検地の歴史的意義」、『歴史学研究』第167号、第12—23頁。

⑩ 关于当时学界对此的讨论,可参见社会経済史学会編『封建領主制の確立:太閣検地をめぐる諸問題』、有斐閣、1957年。

此外,安良城盛昭带来的冲击也使学界将目光转向近世本身,而非在中世与近代之间寻找近世的特殊性,在这个意义上,安良城盛昭也赋予近世以独立地位,使其脱离了“中世”的藩篱。

关于寄生地主和太阁检地的讨论,使近世史研究开始专注于近世本身,但如将近世作为一个独立课题考察,就不能不抛弃“近世特殊论”的史观。这就要求史学界重新思考历史研究中“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在二者之间寻求近世的地位。1955年远山茂树等人编写的《昭和史》,以统治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对抗为中心书写昭和时期的政治史,对此,龟井胜一郎认为该书缺乏具体的“人的视角”,只有抽象的阶级,对历史的解释机械而公式化。^①以《昭和史》论争为契机,日本史学界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及史观的讨论。相似的问题也存在于近世研究中,例如,针对安良城盛昭的时代划分,永原庆二以日本南北朝之前的庄园经济作为封建制前期阶段,^②而黑田俊雄则以庄园内出现的主从关系类比西欧存在的封君封臣制度,视其为封建时代。^③讨论虽然意见不一,但这种以社会形态定义历史的方法往往都强调历史的普遍性。1956年中国、苏联史学家来日交流之后,日本史学界认识到,历史的普遍性在现实中存在多种表现形态,不宜用某种标准机械地套用在一国的历史之上。奈良本辰也批评过去所谓“历史类型”的理论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则,而是探索事物性质的相对尺度。^④安良城盛昭也主张将“研究特殊存在的理论”和“发展阶段论统一加以研究”,^⑤不应拘泥于历史的普遍性而过分强调“近世特殊论”,近世的特殊之处应被当作理论的具体表现加以处理。

日本史学界摆脱“近世特殊论”的努力,使近世史研究走向了国家史研究的方向。以往孜孜于近世变革主体或阻碍变革原因的研究,不过是近代史观在近世史研究中的反映,欲将近世作为一个独立研究对象,就应为近世在日本历史中找到位置。正如原秀三郎等学者所指出的,“战后科学的日本史研究的主流在探讨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结构特点上成果显著。与此同时,也到了重新审视我国各个历史阶段中阶级斗争的特质及其对我国历史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时候了”。^⑥换言之,以往的近世研究关注社会结构及阶级斗争等课题,却忽视了近世作为日本国家史的意义。安良城盛昭提出“近世封建革命”论之后,于1959年继续他对太阁检地问题的研究,他在《幕藩体制社会的成立与构造》一书中认为,“所谓幕藩体制社会的成立,基本上是以单婚小家族自营农民为农奴身份核心的农奴制定义的社会结构,仅此而已,另外,这一体制成立过程中,又伴随着对庄园体制下以一定结构比重残存的‘家父长的奴隶制的否定、克服的历史事实’”。^⑦虽然仍以土地所有制为研究对象,但所关注者并不局限于近世社会形态,而下移到大名与藩国的层面,考量幕藩体制如何通过“检地”而建立起来,实际上已开启了国家视角的近世研究。安良城盛昭之后,佐佐木润之介在国家视角方面更进一步,既继承了社会构造论观点,又批评此前的近世史研究“只是将幕藩制国家视为前近代的一种国

① 龟井胜一郎「現代歴史家への疑問——歴史家に『総合的』能力を要求することは果たして無理だろうか」、『文芸春秋』1956年3月号。

② 永原慶二『日本の中世社会』、岩波書店、1968年、第274—290頁。

③ 黒田俊雄「中世の国家と天皇」、家永三郎編『岩波講座日本歴史』(第6巻)、岩波書店、1963年、第261—302頁。

④ 奈良本辰也「歴史における法則」、江口朴郎編『講座歴史』(第1巻)、大月書店、1955年、第55—98頁。

⑤ 歴史学研究会編『時代区分の理論的諸問題:歴史学研究会1956年度大会報告』、第76頁。

⑥ 原秀三郎「発刊にあたって——その意図と経緯」、原秀三郎編『大系日本国家史』(第3巻)、東京大学出版会、1975年、第1頁。

⑦ 安良城盛昭『幕藩体制社会の成立と構造』、御茶の水書房、1959年、第174頁。

家形态,因此认为其社会和国家处于未分离的状态,不具备明确的问题意识”。^①他认为前人仍将近世作为一种社会形态进行研究,故提出从国家的角度探求近世,以“兵农分离制为国家统治原则、石高制为土地所有体系、锁国制为再生产体系”定义近世,将近世作为一个“幕藩制国家”。^②佐佐木润之介是这样描述幕藩制国家的形成过程的:兵农分离之后,幕府控制了作为直接生产者的“百姓”,而过去直接统治百姓的武士阶级则被排除在生产过程之外,在政治上被纳入幕藩体制,“单个的领主被编入中央权力之后,才确定了作为领主的统治权”。^③朝尾直弘在论及幕藩国家时,也以将军权力的创建作为国家形成的第一要义,“将军权力乃决定国家意志的最高权力主体”,^④而将军权力所以能贯穿幕藩体制上下,凭借的是超越封建关系的“公”的概念,即所谓“公仪”,公仪既描述了幕府对百姓及武士的统治原则,也描述了藩大名对藩国的统治原则,因此,“公仪国家”是近世异于古今的要点。^⑤幕藩国家论一出现,近世研究很快打开新局面:近世所独有的军役制、锁国、身份制度等课题,不再是讨论日本近代进程落后的切入点,而成为讨论近世国家形成的重要论题,近世亦由此获得了独立的地位。

四、回归当代的“近世”

幕藩国家论的出现,代表了近世研究的自立。近世之自立,既脱离了“从近代看近世”的价值取向,也与中世划清了界限。随着近世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家视角的研究取径开始捉襟见肘,这就要求以自下观察的视角研究近世。与此同时,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近代化论修正了传统的近代化概念,试图在近世中寻找近代的因素,自下视角的研究则为佐证近世与近代之间的连续性提供了条件。

国家视角的近世研究在微观层面上受到了挑战。例如,关于地域权力问题,佐佐木润之介的“幕藩国家论”提出后不久,山本博文质疑地方藩国的权力是否必须出自中央的幕府,他认为,藩国大名自战国以来存在的独立性并非幕府所能否定,将军的“公仪”未必是藩国成立的必要条件,并以萨摩藩为例,指出藩内文书中以“天下”自指,藩内法令也出自大名,其政权并不依赖将军公仪而成立,他认为所谓幕藩制国家实际是“以诸大名为领主阶级代表的联合政权”,^⑥否认自上而下的国家视角。池享则以毛利氏为例,认为大名藩国权力的来源是复杂的,不仅有来自中央的“公仪”权威,还依赖国人领主、惣国一揆、一向一揆这样的地域权力。^⑦

再如,在近世身份制度问题上,持幕藩国家论的学者往往以兵农分离为核心,认为近世身份制度出自中央的强制推行,如高木昭作提出个人身份由“国役”决定的理论,即人民因在国家统治体系中处于不同位置,负担不同“国役”而有不同身份。^⑧但是,山本博文指出百姓所负担的“国役”未必完全出自国家,有不少是来自藩国。^⑨因此,当“国役论”受到批判之时,“国役决定身份”的理论必然也

① 佐々木潤之介:「本巻のむすびとして」、原秀三郎編『大系日本国家史』(第3巻)、第337頁。

② 佐々木潤之介:「幕藩制国家論」、原秀三郎編『大系日本国家史』(第3巻)、第95頁。

③ 佐々木潤之介:「幕藩制国家論」、原秀三郎編『大系日本国家史』(第3巻)、第40—42頁。

④ 朝尾直弘:『將軍権力の創出』、岩波書店、1994年、第1頁。

⑤ 朝尾直弘:『將軍権力の創出』、第319—326頁。

⑥ 山本博文:「佐々木潤之介著『幕藩制国家論』(上、下)」、『史学雑誌』1985年7号、第102頁。

⑦ 池享:「戦国期の地域権力」、歴史学研究会等編『日本史講座』(第5巻)、東京大学出版会、2004年、第1—38頁。

⑧ 高木昭作:『日本近世国家史の研究』、岩波書店、1996年、第107—136頁。

⑨ 山本博文:「佐々木潤之介著『幕藩制国家論』(上、下)」、『史学雑誌』1985年7号、第100頁。

受到挑战。与国家层面的身份制度论相对,朝尾直弘以其对“复数的自律性主体群”即对地缘性共同体的研究,提出近世身份制度乃根基于个体在地缘团体中的位置,至于国家规定的身份,不过是共同体身份的“外皮”而已。^①在此问题上,国家视角也下降到地域层面。

当幕藩制国家论无法准确描述日本近世时,近世的概念则不可避免地走向碎片化,下层视角取代了国家视角,成为观察近世的新取径。这种自下的视角,为后来的近世研究提供了出发点。与此同时,主张重新认识日本近代化的“近代化论”则为后来的近世研究提供了方向。

虽然在近代化论兴起之前,曾有部分学者强调近世与近代之间的连续性,但这种论点并未存在多长时间。如内田银藏认为,近世在产业、生活、文化各方面已有了极大的进步,近世“是为在此后世世界交流时代中作出巨大飞跃而存在的休养准备的时期,国民力量在此期间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与利用”,^②“明治、大正时代也可被认为是近世”。^③内藤湖南1921年的演讲《关于应仁之乱》中提到,“大体上为理解今日之日本而研究日本历史,古代历史研究几乎无必要,了解应仁之乱以后历史即已足够”,^④认为应仁之后,日本文化在普通大众中普及,故近世为日本文化的古今分水岭,“其间养成种种思想,对后来日本统一大有帮助,造就了今日最具统一观念的国民”。^⑤1932年,西田直二郎则以江户时代出现的伦理道德为当代日本文化的源头,认为“所谓近世,是与吾人所处的现代有同样的生活形态的一个时代区划,可谓是同一个时期”。^⑥这种强调近世、近代之间连续性的时代划分由于缺乏具体历史意识与实证研究,仅成一家之言,当学界厘清近代概念,尤其是唯物史观史学兴起之后,以上论点就湮没无闻了。随着日本战后经济复苏乃至高速发展,日本人重拾对传统的自信,因此近世与近代之间的关系也得到重新讨论。1960年在箱根举行的“关于日本近代的国际研讨会”使这一讨论变得表面化。在这次会议上,日本近代化的成功被认为与近世以来的社会变化不无联系,与会的美国学者霍尔(J. W. Hall)认为,近代化不应拘泥于传统上的西欧近代化标准,而应有适应具体国家的“共通的理解”,^⑦他提出七条定义近代化的新标准,^⑧认为日本近世形成的官僚制度、社会组织、国内市场及教育的普及造就了日本近代化的成功。1973年,霍尔等人的《近代早期日本制度史研究》^⑨一书被译成日语,同时,这种强调近世、近代之间连续性的观点也为一些日本学者所采信。例如,大石慎三郎在1977年出版的《江户时代》一书中认为,近世是真正意义的平民登上历史舞台的时代,他考察了近世在农业、社会制度及物质文化等方面的成就,强调近世与明治之后时代的密切联系。^⑩大石慎三郎进而在1983年至1985年举办的“江户时代与近代化”学术研讨会上明确反对把近世视为“近代日本建设的脚镣”的观点,主张将近世视为现代日本的原型,甚至提出“以战国末期左

① 朝尾直弘『朝尾直弘著作集』(第8卷)、岩波書店、2004年、第378頁。

② 内田銀藏『内田銀藏遺稿全集』(第3輯)、第226頁。

③ 内田銀藏『近世の日本』、第4頁。

④ 内藤虎次郎『日本文化史研究』、弘文堂書房、1924年、第193頁。

⑤ 内藤虎次郎『日本文化史研究』、第218頁。

⑥ 西田直二郎『日本文化史序説』、改造社、1932年、第519頁。

⑦ J. W. Hall, “Changing Conceptions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Japan”, in M. B. Jasen, ed., *Changing Japanese Attitudes Towards Moderniz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 8-11.

⑧ J. W. Hall, “Changing Conceptions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Japan”, in M. B. Jasen, ed., *Changing Japanese Attitudes Towards Modernization*, p. 19.

⑨ J. W. Hall, M. B. Jasen, *Studies in the I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arly Modern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8.

⑩ 大石慎三郎『江戸時代』、中央公論新社、1977年。

右为界将日本历史一分为二”的时代划分。^①

由此,当时不少学者开始从各自领域讨论近世与近代之间的连续性。例如在农业方面,佐藤常雄提出,战后初期日本农业的作业体系、开垦面积、农户数量从江户时代即已确定,而在农业技术方面,明治时代的农书也可以直接追溯到江户时代,^②反映出近世与近代之间的连续性。在产业方面,中村哲认为近代日本纺织业的领先地位,并非完全来自明治维新对西方工业体系的引进,他以棉纺织业为例,认为近世日本已完成棉纺织业的产业化与市场化,这是日本近代化的先决条件。^③在法律方面,荃田佳寿子以江户时代法律发展为例,指出当时法律已经具有普遍化、程序化、明文化的趋势,具备了近代法律的许多因素。^④

此外,关于社会组织的研究也常常显示出近世与近代之间的密切联系。森谷尅久以近世京都的町共同体为例,认为町共同体自选官员、自定法规、豁免地租,是一种经济独立、行政自治的共同体,视其为近代以后日本城市自治体的原型。^⑤有本宽则以近世村落中的村请制度为例,认为近世村落同样是一种地方自治体,最终发展成日本农村的自治制度。^⑥中根千枝关注江户时代的家庭结构,认为近世以来,日本家庭以单婚小型家庭为主流,现代日本“家庭”的原型即源于此。^⑦

在思想研究领域,同样可见近代化论的影响。战后日本哲学界有不少声音主张重新审视传统,例如丸山真男在1952年曾提到,“在一片‘超越或‘否定近代的呼声中,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着眼于明治维新的近代性的地方,乃至德川社会中成熟的近代化因素”,^⑧他提出,日本的思想层面的近代化并非否定传统,而是整合传统,脱离传统是无法说明日本近代思想的。^⑨由此,在思想方面,近世也与近代发生联系。例如,日野龙夫认为,江户时代的儒学思想不仅不是近代化的障碍,反而促使日本较早地形成了近代化的“日本国”概念;^⑩宫田登提出,现代日本宗教的组织架构、信仰特点及地域性特征,实际都可追溯到近世的日本宗教;^⑪此外,就战后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有不少学者从传统思想角度加以解读,例如作道洋太郎、间宏等学者都以日本式的经营方式为经济成功的原因,而这种经营方式的三大要点(终身雇佣、年功序列、企业内工会)则都是近世遗留下的传统。^⑫

诚然,在当今日本史学界,“近世”仍拥有一席之地,学界并非一致主张将近世与近代混为一谈。就在1983年的“江户时代与近代化”学术研讨会上,与会的中村哲、荃田佳寿子提出,明治维新具有划时代意义,近世与近代之间仍存在较大差异。但正如大石慎三郎所回应的,他并非认为近世与近代之间不存在区别,但必须注意到日本近世发生的巨大变化对日本近代化产生的重要影响。^⑬近世

① 大石慎三郎「現代日本の原型は江戸時代にめるか」、大石慎三郎編『江戸時代と近代化』、第7—15頁。

② 佐藤常雄『貧農史観を見直す』、講談社、1995年。

③ 中村哲「農業・工業・商業の結びつきと分離の中で」、大石慎三郎編『江戸時代と近代化』、第51—59頁。

④ 荃田佳寿子『江戸幕府法の研究』、巖南堂書店、1980年。

⑤ 森谷尅久「産業都市として抜群だった京都」、大石慎三郎編『江戸時代と近代化』、第39—45頁。

⑥ 有本寛「開発経済学からみた自治村落論」、『農業史研究』2006年40巻。

⑦ 中根千枝「経営体としての『家』の出現」、大石慎三郎編『江戸時代と近代化』、第120—124頁。

⑧ 丸山真男『丸山真男集』(第5巻)、岩波書店、1995年、第290頁。

⑨ 丸山真男『日本の思想』、岩波書店、2014年、第6頁。

⑩ 日野龍夫「江戸時代の儒学は『日本国』を意識した」、大石慎三郎編『江戸時代と近代化』、第302—309頁。

⑪ 宮田登「江戸時代に再編成された日本の宗教」、大石慎三郎編『江戸時代と近代化』、第234—246頁。

⑫ 間宏『日本経営の系譜』、文真堂、1989年。作道洋太郎「日本の経営はいかに形成されたか」、大石慎三郎編『江戸時代と近代化』、第201—208頁。

⑬ 大石慎三郎編『江戸時代と近代化』、第13—15頁。

研究中越来越多近代因素的涌现,虽然未必将近世与近代等而视之,却淡化了近世作为“前近代”的含义,反映出身处“当代”的学者对“近世”概念的时代认同。

结 语

起源于江户时代的“近世”一词,在明治维新之后失去了“当代”的内涵,成为“近代”的对立面。作为“前近代”的近世被学界以“封建”的属性加以把握,在历史分期中不免被置于“中世”的宏大概念里。

战后初期的近世研究一度延续了近代化的影响,视“近世”为中世到近代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时代。经过学界对历史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反思之后,近世研究者开始从社会构造与幕藩国家的角度,将近世视为独立的研究对象。

随着近世研究的深入,上层视角在诸多方面无法准确描述近世,使下层视角成为新的研究取径。以此为前提,在近代化论影响下的近世研究在产业、社会组织、思想等多个领域将近世与当代联系起来。日本学界对近世的历史认同,使“近世”又有了“当代”的含义。

近世一词含义的变化、独立和回归,不仅是研究取径及论题的变化,也反映出近代以来日本学界对本国前近代历史的心态,由否定转而客观进而肯定。这既是因为研究逐步深入而以近世为独立研究对象,也是因为学界反思传统近代化理论与战后日本社会经济发展现实。在今天的日本各地,关于近世的片段往往是当地人自我认同的开端,关于近世大名、市町的遗存,是各地博物馆馆藏最丰富的内容,幕藩时代的历史与明治维新以来的历史并未断裂。江户时代日本人的“最近”,一度成为后世日本人的“昨天”,最终依旧回归原义,成为当代日本人的“最近”。这是现代日本人与近世日本人对时空的共感,亦是现代日本对近世日本的肯定。日本之所以能求得现代与传统的共存,其原因大概如此。

(作者喻乐,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邮编:510275)

(责任编辑:吴英)

(责任校对:董欣洁)

historiography is comparable to Renaissance historiography , for historians during both periods shared similar conception of historical views and historiographical methodology. As Renaissance historiography is the origin of modern Western historiography , its counterpart Song historiography pioneers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Since Song China predates Renaissance Europe ,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Song is the pre-modern stage when many modern tendencies had already unfolded i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prior to the contact with the West. Furthermore ,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uncover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historiographies.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Kinsei* in Japanese Historiography // Yu Le

As a historical term , *kinsei* appeared in the Edo period in Japan , which originally referred to the *recent era* by people of the time. After the Meiji Restoration , *kinsei* was used to refer to the Edo period , while its connotation was classified as a stage of the medieval era opposite to the “modernized” Meiji period. After World War Two ,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research , *kinsei* was regarded as an independent period apart from the medieval era. Later with the rise of area studies and modernization theory , the connection between *kinsei* and the modern era was emphasized , and *kinsei* was again accepted as a *recent era*. The conception of *Kinsei* has changed , becoming independent and eventually returning to its origin.

New Materials , New Methods , and New Perspectives in the Study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A Case Study of the Harry J. Benda Book Prize // Shi Xueqin , Wang Han

The Harry J. Benda Prize is an international academic prize granted by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to recognize outstanding works in the field of Southeast Asia studies , including books that represent the most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in the study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in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ircles. The Benda Book Prize covers works in the fields such as the colonialist history , social history , cultural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 and it continues to expand to religious history , women’s history , and other specific historical genres. These works reflect the important shifts in the research paradigms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after World War II , and they also stress the indigenous and autonomous nature as well as the agency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Southeast Asia based on new historical materials , methods , and perspectives. In short , Benda Prize works have greatly contributed to the contemporary theoretical discussion and practical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ical studies , and scholars in China nee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ir scholarly value.

“The Black Atlantic” : A Survey of Recent Studies on the Role of Africa in Atlantic History // Li Pengtao

Atlantic historical studies are primarily focused on the transatlantic connections between Europe , America , and Africa from the late sixteenth century to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Since the 1990s , African historians and American historians have criticized the Eurocentric tendency in Atlantic studies , and they have promoted the notion of “the Black Atlantic” . While stressing the exploitation and violence that African society had experienced , these historians are fully aware of the significance of African society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Atlantic world. These researchers examine the role of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world , the impact of the Atlantic Connections on African society , the origin of African diaspora culture , and African contributions to American civilization. They stress trans-colonial or transnational dynamics. This research trend has not only corrected the weakness in research methods of Atlantic studies , but also widened research scope of African studies and facilitates our understanding of Africa’s and the African continent’s contribution to world histor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eory of Historiography and the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 Qiao Zhizhong

The theory of historiography and the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belong to the same secondary subcategory in the discipline structure. This categorization indicates the clos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eory of historiography and the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 we should first overcome a theoretical challenge , which is how to distinguish “historical theory” from